

编者按 :瑞安素有“东南小邹鲁”美称,可谓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。在我们身边就有诸多老地方,其耳熟能详,且典故流传多。从今日起,本版将推出瑞城老地方系列文章,敬请关注。

塘下石冈村： 瓯人从石冈陡门 走向海洋

宋维远

瑞安塘下镇有个石冈村,望名生义,此村却不是因石头的山脊而得名,而因村中那座宋代陡门是瓯人开发海洋的见证者而成该村历史典故。陡门本是海堤中的水闸,我们的祖先瓯人,都叫它陡门,也称海堤为海塘。瓯人最初被大自然安置在浙南山海之间,就是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所说的“瓯居海中”。

海塘挡潮 陡门蓄淡

瓯居海中,故瓯地海塘、陡门很多。其中瓯江与飞云江河口之间的海塘、陡门很具典型性。先人在海涂上逐段挖泥筑塘挡潮,再连缀成一条南北间的第一代古海塘,便是今温瑞海塘(塘内挖泥成河叫塘河)的雏形。海塘外挡海潮冲击,内保家园、农田的安

全,塘河又蓄积着西边群山下流的淡水可供饮用和灌溉农田,还可撑船运输。但夏秋山水下流过多,塘河水溢,必须在海塘中开几个闸门放水入海。塘外的盐田、盐灶所煮的海盐,又靠闸外浦沥运回塘内。这个水闸,就是瓯人所称的陡门。

木鹅选陡址 伐石代木材

温瑞平原的众多陡门中数石冈陡门最著名,今仍保持原貌,它是这片平原沧海桑田的见证者。此陡始筑于北宋元丰三年(1080),第二年竣工。之前,温瑞海塘中段先有第一代鲤鱼山陡门,在今仙岩穗丰村南,遗址已经湮没,唯这座10多米高的小山——鲤鱼山像条鲤鱼横卧在温瑞塘河东岸。陈傅良《重修石冈陡门记》称:前陡在“穗丰山南”。距石冈陡门西偏北直线约3500米,可能初筑于南北朝(420—589)间。到北宋元丰初,海岸因自然海退,离鲤鱼山老陡门有三四千米,无法调节老塘河内外的水利。故瑞安县令朱素和塘岙隐士林石等倡议在新海岸建新陡。当时,瑞安帆游、崇仁、清泉三乡、一都至十一都(今丽岙、仙岩、塘下、莘埭、瑞城东郊)的农民对选择新陡地址意见不一。朱素令人做了数十只木鹅,乘雨后山水下泄时分别放在西边及大罗山各条溪流上游,使其顺水下“游”,结果木鹅都汇在石冈河汇,证明此处是新陡的理想地址。但又有人认为此处无山冈可依托,涂泥太松,恐新陡会被海潮及山洪冲垮。县令又带队到石冈挖土,见地下多山上冲下的碗埫沙碛,说明这里基础较坚

固,于是群众一致赞成。可见当时选址较有科学依据。元丰四年石冈陡门建成后,石冈以西大片滩涂、盐田因有淡水灌溉垦为农田,新辟村庄较多。百多年后,陡门屋、闸的木头大都腐朽损坏,而股岸、沟底三丈长、径尺厚的巨松木因浸在咸水中仍屹然存在。之前,在陈傅良、林松孙(林石之孙)的数十年勘测、倡议下,仍未重修,到南宋淳熙十二年(1185)年才由温州知州、同知李穡、谢杰和县令、主簿刘龟从、石宜翁拨州县公款,加上民间劝募经费,动员三乡民工加以重修。这时,工匠黄廷瑞等三人提出“以石代木”的创新之举,用石材代替传统松木(之前,浙南陡门均以松木为陡门主材)取得改革成功后,在各地推广。这个浙南首创的“以石代木”的石冈陡门,成为浙南水利史美谈。此后,石冈陡南北伸延的海塘(堤)比老海塘已向东面移动三四千米了,捍卫着新陡以西2000余顷农田和村庄。500年后,又有以东的第三代的龟山陡门接替石冈陡门的职责。石冈陡门整整守卫着温瑞沿海平原五个世纪,现在仍旧是瓯人开发海洋的见证者。

双桥苦,半是亭民半戎户

石冈陡门筑成后,西面那片老盐田因远离海岸咸水东退,不能再制盐而垦成农田。而陡门东面的今梅头、海安、场桥、鲍田一带新淤的海涂又新辟大片盐田,促进两宋时温瑞滨海地区盐业的发展。但当时盐民(亭民、亭户)是世袭的,宋朝定下的身份不变,交纳盐税、服兵役,仍由子孙承袭,苦不堪言。今塘下镇双桥村就是个典型例子。此村

在穗丰之西、石冈之东均约1800米。宋元丰前尚可煮盐,石岗筑陡后海水已涨不到双桥了。但到300年后的明朝永乐(1403—1424)间,双桥人仍未摆脱亭户身份。所以此时双桥文人虞原璩写了《双桥苦》诗,开头和结尾有:“双桥苦,半是亭民半戎户”、“瑞乡无如双桥苦”的句子。石冈陡门正是此诗的有力佐证。



石冈陡门

近代瑞安金融业先驱 活账本 俞象川

俞光

俞象川(1910—1985)名亚文,以字行,浙江瑞安人。父俞春如,兄俞大文,均为近现代瑞安文史学者。

俞象川幼从父课读,粗通文墨,十四五岁因家境贫困进瑞安一钱庄做学徒。但他勤奋好学,自学成才。3年学徒期满,因精明能干,忠诚可靠,受到(老板)徐远山赏识,被提升为掌柜。1935年5月,他又任瑞安县丰和酱园会计。

筹建浙行瑞安办事处 建立5家农贷所

1935年初,浙江省地方银行打算在瑞安筹建办事处,便从瑞安钱庄中物色人选,选中了俞象川。据俞象川回忆,那年春末,应省行总经理徐恩培之邀,他偕同温州分行经理李惠衡、瑞安县金库主任汪周之赴杭,商谈筹建瑞安办事处事宜。到杭后,他们拜访徐总经理,汇报有关情况。此后徐又数次单独接见俞,对他所撰的调查报告《瑞安经济生产调查》倍加赞许,详细询问瑞安一带的生产及民情等,并告之他们回去后立即着手筹备瑞安办事处。俞象川在杭逗留3周,仔细考察省行的业务情况,对筹建之事胸中初有成竹。回瑞后,又经2个多月的具体准备,同年10月,浙江省地方银行瑞安办事处在县城小沙巷口宣告成立,开瑞安官办金融机构的先声。全处5人,俞象川任办事处主任。经营业务主要为存、贷款、汇兑。旋又接收县金库的业务,即对全县的财政、赋税、县政府各部门的经费收支、出纳等。

办事处成立初,没有自己固定资金,并想方设法发动全县各界踊跃存款。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记载,成立次年,办事处存款总额达1506万元。在贷款方面,办事处经调查研究,主要投向工商界急需解决的货物堆栈建设。办事处还热情细致为用户办理汇兑业务,全年汇出总额1303万元,汇入总额6471万元。1936年,俞象川作为金融界代表被选为瑞安县商会理事。

因原店面过于狭小,难以拓展业务,办事处与在上海开商行的瑞安人何洛夫协商,请他将大沙巷口的几间店面及火烧地拆建成二层洋房出租给办事处,作营业大厅和办公用房,并新建钢筋水泥库房,共占地近二亩,在

当时瑞安城内堪称颇具气派。

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,日军封锁我国东南沿海,全县经济受到沉重打击。当年,办事处贷款总额急剧下降到912万元。俞象川将经营业务转向农村开拓。次年,瑞安办事处存款总额恢复到1568万元,贷款总额恢复到1829万元,分别超过和接近战前水平。

1940年间,俞象川带领大家调查瑞安江南、陶山甘蔗种植及制糖业、农村奶牛饲养业等情况,在此基础上执笔撰写《瑞安农村经济状况报告》,建议设立农贷所。报告经温州分行批准,办事处在海安所、塘下、林垟、仙降和陶山等5处建立农贷所(后改为分理处),使农村信贷业务迅速扩大,抵押品有油菜子、槐豆、茶油、菜油等。在大家共同努力下,克服种种困难,该年办事处存款总额为4119万元,贷款总额为3666万元。

不顾个人安危 让银行资产不受损失

1941年4月19日深夜,日军为掠夺战略物资,悍然侵犯瑞安。接到警报后,俞象川通知办事处全体职员及挑夫迅速集中,将现金、账册和贵重物品连夜整理装担,转移出城。先撤离到城北山,原打算向陶山方向撤退,后来听说陶山方向已出现日军,临时改变计划,折向南面渡江到马屿,再经平阳坑、高楼来到百丈屿,徒步行走100多里路,终于保住银行资产不受损失。途中,俞象川被持枪兵痞扣押,勒索军饷,但他不顾个人安危,尽力周旋,始终不允。据俞雄回忆:“那天父亲身上发烧,头上盖着毛巾,躺在一张靠背椅上,周围围着持枪兵痞勒索的情况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”

当年省行决定,将办事处升格为支行,俞象川任经理。同时将成立于上年,经营业务陷入困境的瑞安县合作金库并入支行,他兼任县合作金库理事会主席、县合作农贷理事会主席。支行下辖平阳、鳌江、泰顺办事处,并在大垟设立分理处。由于日军对瑞安连续轰炸

和侵犯,使瑞安经济受到严重破坏。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,瑞安办事处全年存款总额6530万元,贷款总额8824万元,主要业务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。

最早推行新式会计簿记 引进制版铸和铅字技术

随着业务和机构扩大,业务人员倍感缺乏。俞象川决定在瑞安公开招收10多名年青职员,亲自帮带,精心培育,并在瑞安最早推行新式会计簿记。

1942年7月1日,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《统一发行法币办法》,要求各银行限期收缴此前发行的钞券。俞象川回忆:“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温州转来的总行密电,要我们立即收缴伪中央银行发行的‘七版券钞票’,并限于当天收兑结束,逾期不予兑换。消息传出,来银行兑换的群众络绎不绝,直到下班还无法结束兑换工作,我就电话请示温州分行负责人,要求延长兑换时间,但被拒绝了。无奈之下,他自作主张,把当天银行下班时间延长3个小时。”事后,他被降级调任浙江省地方银行海门办事处主任。1944年初辞职回温。

1944年3月,俞象川与温州王鼎元、奚百里等人合股创办温州中华铸字制版印刷厂,任经理。他在温州最早引进制版和铸铅字技术,使温州印刷业发生革命性变化。1946年初,因熟谙金融,他在瑞安县益泰钱庄任经理;1947年上半年,又在温州信孚钱庄任经理。1948年瑞安县商会改选时,他再次当选为理事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他先后在温州市内河轮船公司、温州地区航管处、温州港务局担任主办会计。他小儿子俞崇说:“父亲长期住在办公室后面数平方米的小房间里,常常工作至深夜,很少回瑞安的家。他对业务精通,人称‘活账本’。他还热心培育青年财会人员。他以工作认真负责和出色的业务能力,基本上年年被评为单位以至温州市先进工作者。”他直至1975年退休。

瑞安市社科联 协办
电话：65818090
电子信箱：941222480@qq.com

